

迁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12月

目 录

杨秀峰在“五四”运动前后	刘绍友 (1)
迁安县农工运动的兴起	果夫 刘贵 (6)
冷口抗战	阎淑凤搜集整理 (12)
冷口抗战纪实	阎淑凤搜集整理 (17)
冷口抗战前后的回忆	齐占一 (27)
迁安板栗	唐家礼 (31)
迁安县“五一”煤矿艰苦创业史	张凤君 (36)
建国前的迁安合作社	高廉民、李太 (41)
回顾解决山区人畜饮水难的历史	燕宝恒 (46)
公立钱局	李靖华 (50)
评剧早期名旦——张凤楼	王大勇 (53)
迁安县立简易师范附属小学校建立前后	杨志忠 (59)
日伪据点里的完小校长——李显宗	李仲三 (62)
刘襄臣先生教思碑	兰玉芬 (68)
迁安境内的长城	殷玉清 (74)
蹲点落户的好干部——范德富	张惠卿 (78)
忆燕石同志二、三事	刘贵明 (85)
山戎国综述	宋奎 (89)
侯树盗墓	王林春整理 (95)

杨秀峰在“五四”运动前后

刘绍友

七十年前，北京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杨秀峰是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学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时，他处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迎着席卷中华的革命风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进行了艰苦而卓绝的斗争。

一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时代，是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十分黑暗混乱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的时代。

1911年，年仅14岁的杨秀峰，在迁安县立高小毕业后，违背了父亲杨敬修“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训诫，考入了直隶第三师范学堂（河北滦县师范学校）。杨秀峰在直隶第三师范校（1912年更改为学校）求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封建势力全面复辟的时候。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倒袁的革命热潮。杨秀峰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进步活动。1915年，他在直隶第三师范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贴标语，高喊“打倒袁世凯”等口号。声讨卖国贼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罪行。这是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闹起的第一次学潮。因此，杨秀峰被学校当局开除了

学籍。他回到故乡迁安仍继续从事反袁活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杨秀峰才返回直隶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杨秀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渴求知识的愿望，于1916年来到了当时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求学，考入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史地部攻读。

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势力很强，民主空气、学术空气都很浓。杨秀峰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在崭新的环境里，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加之他在史地部所学的课程又都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因此，对他的思想解放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秀峰已从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学生进而转变成为一名爱国志士。

杨秀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刻苦攻读，学业成绩很好，被同学们选为班长。1917年，他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一年。返乡执教于迁安县师范讲习所，以筹集自己学习费用。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客手中。在国事日非，外侮日亟的情况下，中国应向何处去？自己应当怎么办？正当杨秀峰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陷于苦闷和彷徨之际，俄国爆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他那忧国忧民、苦闷彷徨的心胸豁然开朗，杨秀峰看到了希望，开始意识到，要挽救中国，必须走苏联十月革命之路的真理。

1919年初，杨秀峰又返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复学。当时

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趋加紧，国内军阀混战日趋严重的时刻。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北京以至全国出现了山雨未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这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杨秀峰积极地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当时被推选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负责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

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学生数千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人人手执白旗，上书“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中日军事密约！”、“诛卖国贼曹汝林、陆宗舆、章宗祥！”等。大会开始后，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队伍冲过军警的警戒，前往正阳门外市街游行。杨秀峰指挥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他高呼口号，发表演说，谴责“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背弃公道正义的卑鄙行径和痛斥北京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

下午，游行的学生队伍冲进曹汝林的住宅。学生们寻找曹汝林，此时，曹汝林早已逃走。杨秀峰和同学们一起从曹宅搜出了章宗祥，将他痛打一顿。这时，曹宅突然起火，北京市警察总监带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们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赵家楼附近，顿时变成了战场。撞击声、喝骂声，惨叫声交织成一片，震人心肺，催人泪下。足见在反动的统治下，爱国是何等的艰难啊！杨秀峰在同军警搏斗中门牙被打掉两颗，但他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反动派以为用高压政策可以使学生屈服，然而，事得其反，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三十余人被捕。尔后，杨秀峰又参加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工作，积极投入了营救被捕同学的活动，无情

地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

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持，北京高等院校派出了一些代表到外省市联系。杨秀峰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天津，深入到河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宣传联络。报告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情况。五月中旬，天津十数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

杨秀峰懂得要爱国必须唤起广大民众觉醒。所以，他不顾个人的伤势和辛苦，于同年夏季回到家乡。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种传播到迁安城乡。他在迁安教育界作了“五四”运动情况的讲演，号召爱国师生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发动迁安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到县城集市上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搜食日货，教群众唱抵制日货的歌曲，“有钱勿买日人食，没衣勿穿日人裘”。形成了迁安第一次反帝爱国高潮。

三

1921年，杨秀峰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当时，在河间县中学执教的杨秀峰利用假期，和在天津河北工学院任教授的叔父杨十三一起回到家乡，在汤团堡村小学举办农民讲习班。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名，秘密介绍我党在南方领导的农运情况，评说国际形势。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以启发广大民众觉悟。由于杨秀峰在迁安城乡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迁安于1928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反动的军阀政府处以绞刑的消息传出后，杨秀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读着从狱中传出的关于李大钊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的一段话：“钊自束发爱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

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杨秀峰读的是革命先烈拨正乾坤的宿愿，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庄严宣言。同时，也是革命先烈的鲜血第一次浇灌他的心灵。他决心象李大钊那样要立“千秋之功”，不怕承担一切横加的“罪”名。当时，我党发起了“红色互救会”，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杨秀峰挺身而出，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地教授白眉初一起积极为李大钊发动募捐活动。

为了继续战斗，必须进一步充实自己。1929年，杨秀峰辞去了河北教育厅的工作，赴法国留学，翌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面学习，一面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东方反帝同盟”，任党团副书记，负责编印《工人》等革命刊物，翻印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在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杨秀峰被推选为法共中国语言组执委。因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会游行，被法国当局拘捕。1932年2月，经取保释放，被法国驱逐出境。尔后，他辗转到比利时。同年3月，在共产国际的大力协助下，杨秀峰前往苏联进入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和林铁等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当时，王明迫害陈郁同志，威胁杨秀峰说：“谁同情陈郁，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的学习。送工厂做工！”杨秀峰为了维护真理，他面对王明的要挟恐吓，无所畏惧。在一次学生支部会上，杨秀峰严词驳斥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拒绝呼“王明万岁”的口号，高呼“共产党万岁”。当时，王明恼羞成怒，很快设法把杨秀峰送到乌拉尔加里铁矿做电工8个月。杨秀峰在苏联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经过同王明的斗争，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迁安县农工运动的兴起

果 夫 刘 贵

前 奏 曲

1929年春，中共迁安县委在袁庄、韩庄、庙岭头等村组织成立了以赤农会成员为骨干的群众组织“民众会”。4月23日，县委组成若干个宣传小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发动。一夜间，东至山海关，西至遵化，南至唐山，北至峪耳崖等地广泛散发了写有反剥削、反压迫等内容的传单。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的呼声日益强烈。县委见群众已发动起来了，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组织发动了6月8日反对贪官污吏，痛打伪县长戴鑫修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广大雇工和小手工业者起了主导作用，受到了一次革命锻炼。

1935年，韩东征等十几名党员到峪耳崖、王八沟一带以当雇工的身份建立农工组织，开展斗争。加之在长城抗战中对农工影响较大，虽然长城抗战失败了，可是这对农工确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和教育。以上这些斗争和革命活动，都为农工运动的开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工会组织的建立，为抗日和农工增资斗争创造了条件。1943年以后，在各联合县党委的领导下，我县各区、村“工人救国会”（简称工会）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建立起来了。各级工会积极组织领导广大雇工参加抗日和开展增资斗争。

初战告捷

1943年夏，迁卢抚昌联合县第一总区政府鉴于农工工资过低，为了团结组织农工抗日，抓住麦收有利时机，进行了雇工提高工价斗争。同时，还做开明地主的工作，向他们讲解我党的抗日政策和提高工资的意义。号称城里四大绅士之一的李树森，在我党的教育和政策的感召下，首先给工人增加三分之一的工价。在李树森的影响下，大部分地主也为雇工提高了工价。但也有少数顽固地主加以对抗，他们采取不雇附近村的农工来威胁雇工。这一着很厉害，使不少等待出卖劳力的农工失业。为了打击这股顽固势力，鼓舞雇工的斗争，区工会组织耿庄、庞庄等村的广大雇工对破坏增资运动的顽固地主刘老维、耿老方进行了说理斗争。

在这次提高工价斗争中，搞得比较好的梁、庞、耿庄、姚官屯、黄官营、包官营、杨家坡等村，涌现出耿文中、邱鱼海、邱质华、周正良、周正堂、周德厚、张贤等一些比较坚强的骨干分子。通过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广大雇工受到了启发和锻炼，提高了增资斗争的积极性。

再战胜利

第一个战役提高短工工价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大批长工仍等待区工会去解决问题。

区工会在党政领导下，组织发动广大雇工趁热打铁，向地主提出了长工增资条件。可是一些顽固地主还是较磨硬抗，拒绝给长工增资。于是，区领导就发动雇工骨干串连各村雇工闹

罢工。

秋收大忙开始，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之际，杨家坡等村的广大雇工都上了白麟山，进行了集体大罢工。雇工这一行动使地主受到严重打击。罢工第一天，地主就害怕了，要求区政府出面调解。经过区政府的反复调解，区工会代表征得广大农工的同意，给工人增资两至三成。第二个战役胜利结束了，大长了雇工的志气，大灭了地主的威风，这为全面开展增资斗争铺平了道路。

向纵深发展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县广大雇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持久的开展增资斗争。迁卢抚昌联合县一总区增资斗争的经验，成为其它联合县农工运动的样板。

迁卢青联合县二区农工运动开展的也很好。全区共有41个村，为了宣传组织抗日活动和开展增资斗争，都先后建立了工会组织，吸收广大农工加入工会。工会组织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教育，使雇工懂得不仅工资待遇上要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由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上来。

这个区村多面大，区工会力量不足，为把全区农工增资斗争健康地开展起来，他们采取了抓点带面的方法。把刘营、徐流营两村作为增资试点村。徐流营村增资运动搞得比较好，区干部就组织各村干部到徐流营村开会，介绍他们增资斗争的经验。两天后，又在水峪、鹿尾山村召开了雇工大会，动员雇工搞好增资斗争。虽然开了两天会，但是由于一些顽固地主顶着不办，增资斗争进展不快，一些工人很着急。区干部和村工会负责人共同研究总结了开展不起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主要

是由于一些地主的对抗，部分工人存有怕报复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村工会召集骨干分子开会，研究部署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于次日晚，村工会负责人组织广大雇工到地主董福臣家门口贴标语、喊口号，然后游行示威。为了配合雇工的行动，区、村干部同时召集了地主开会，进行宣传教育。这两村雇主在区、村干部教育和工人团结行动的压力下，被迫增了资，年资700斤以上的增3斗，年资700斤以下增3.5斗。

不少地主对抗日观望动摇，在增资上要弄阳奉阴违手法，一方面害怕抗日政府和工人的团结行动，另一方面则不相信抗日会取得胜利，所以口头上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却故意拖延时间不增。如郭庄马如虎、薛庄薛占青和杨各庄杨××等人，一看形势变化就反悔了，工人年终下工向他们要求补发应增的工资时，不但不给，还骂工人。区工会根据工人的汇报，在区政府的配合下，就组织工人召开了斗争马如虎、薛占青的大会。并宣布比其他雇工还要多增一成工资。还当场立契约，下年仍雇佣这些工人。

又如刘营、侯庄、范庄的少数地主妄想与增资运动对着干。他们串通一气，扬言以解雇和不雇当地雇工的手段相威胁，因而使这三村增资斗争受阻。区工会配合村工会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很快拔掉了这些钉子户，打开了这三村的增资局面。

1945年，迁户青联合县二区工会在包各庄召开了全区工人大会。会上，选举组建了区工会委员会。号召全区广大工人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增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动员青壮年参军，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参加会议的800多名工人斗志昂扬，决心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把增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区工会组织广大雇工，利用集日到刘营开展增资斗争的宣传活动。他们擎旗擂鼓，走街串巷喊口号。大张旗鼓的表扬

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和开明地主主动增资的事迹。通过集日的宣传活动，工人們的斗争积极性更空前高涨。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雇工的斗争，全区二千多名雇工普遍增了工资。在这一、二年农工增资斗争中，迁遵兴，迁青平，迁滦丰等联合县都做出很大成绩。迁遵兴联合县还建立了县工救会。

增资斗争掀起新的高潮

抗日战争胜利后，撤销联合县制，恢复迁安县单一县制。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抢夺人民胜利果实，进犯迁安县。从此，我县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广大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些顽固地主兴风作浪，认为有了国民党做靠山，乘机对工人进行报复。一些顽固地主明目张胆的取消了已经增加的工资。

各级工会组织为了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巩固增资斗争的胜利成果，打击地主的翻案风。二区在唐庄、沙坡子、东牛山等村分别召开了雇工和雇主同时参加的大会。宣传我党的政策，分析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别看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凶，我政府主动撤出县城，这都是暂时的，是为了彻底推翻蒋家王朝而采取的行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是长不了的。通过形势教育，广大雇工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少数顽固地主嚣张气氛大为收敛。增资运动又顺利地开展了。全县农工积极参加工会，到1946年初，参加工会农工达到6672人。（包括迁西部分），雇工普遍增了资，最高工资1200斤小米，一般的700斤至800斤，童工也达到300斤。

一些反动地主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妄想摧垮工会组织。

1946年9月16日，盘据在城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围攻了安新庄村，杀害了村工会主任李文付。1947年1月20日，反动逃亡地主伙会头子李春奎带领一伙顽匪，抓捕了曾斗争过他的村工会主任马万全，并把他杀害于村子外边。李文付、马万全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雇工上前线杀敌立功

经过增资斗争的锻炼，广大雇工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消灭日寇，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人民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巩固胜利成果。为此，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模范事迹。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参军高潮中，仅揣庄一起参军的雇工就有25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全村雇工参军人数达80人。据1946年不完全统计，全县有600多名雇工参军。

同时还有大批雇工积极加入民兵组织，他们提出：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一边生产，一边开展对敌斗争。大魏庄民兵战斗英雄薛化成（雇工）曾带领民兵多次打退敌人的偷袭。使敌人闻风丧胆，被冀热辽区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6年三区广大民兵还配合部队到口外去打匪3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部队和地方的好评。

冷口抗战

阎淑凤综合整理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离开北平，何应钦受蒋命到北平主持华北局面。这时蒋介石正在竭其全力对付江西的人民武装力量，不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开驻华北，同时，蒋介石心里既怕日本人不愿意，也不敢开军队到华北来。这时原来驻在华北而战斗力稍好一点的队伍，只有二十九军了，于是，一部分二十九军，就由何应钦从山西调到北平附近，驻防通县、蓟县一带。

日军占据热河后，即挥兵南下长城各口，窥伺平、津。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急忙沿长城布防，委商震为华北第二军总指挥，下辖三十二军、东北军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六十七军汤正治部，在冷口一线防守，军部驻开平。长城其他各口的防御，独石口由傅作义部防守，古北口由中央军徐庭瑤十七军（辖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徵、第八十三师刘戡）防守，喜峰口由宋哲元二十九军防守。由长城撤下的东北军经休整后，在天津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守，另以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牵制日军后方。同时，命令二十九军，以一部分兵力出冷口御敌。宋哲元奉令后，命何基沣率骑兵两营到冷口执行警戒掩护任务。另命王长海团开到建昌营，以为策应。

三月四日，何基沣营到了建昌营，即遇沈克所率领的一〇

六师，遭到日机迫击轰炸，从冷口向南溃退，枪炮辎重，遗弃遍地，零乱不堪。何基沣军在冷口布防，扼守要隘，并帮助沈克收容溃兵。到了六日，二十九军奉令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峪止，长达三百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诸要隘，而将冷口交商震的部队接防。

商部开至冷口一线时，即上一四一师沿滦河两岸构筑工事。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地冻似铁，官兵作业极为艰苦，附近群众知是为了打日军，纷纷出来帮助。开滦矿务局更慨然以万余把洋镐借，洋镐未用一天即已磨钝，工地上便支起烘炉，随时锤打淬火。商震经常穿梭于战地之间，提出“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口号。连这一年春节，也是在锤镐叮当中度过的。

三月初，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进攻喜峰口，遭到二十九军爱国官兵猛烈抗击。中国军人拼上自己的血肉之躯，用中世纪的大刀作武器，与拥有飞机、坦克的日军展开一次次的肉搏。旅长赵登禹带伤冲锋陷阵，师长刘汝明也挥枪亲临前线，官兵们明知必死也一往无前。月余的抵抗，使日军付出惨重的伤亡，未能越长城一步。二十九军亦有数千名烈士血洒雄关。

喜峰口之战，使举国大为振奋，鼓舞了中国军队的保国杀敌之勇气。

在喜峰口血战方酣时，商震部一三九师奉命据守义院口至冷口的东线，一四一师扼守冷口（含）经白羊峪至董家口的西线，商震对赴长城作战是十分坚决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何应钦本来并非为全力抗日，而是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旨意，维持不战下降的局西，争取时间以“剿除”南方共产党。而国民党内部从上到下都在指望与日“交涉”成功，

战争便可避免。蒋介石政府既然抗战不积极，商震亦随之不得不在强敌面前考虑自己的立身之本——军队实力保存之问题。商震身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在军事上须服从何应钦之参谋团的总体部署。其时，一三九师在冷口至义院口长百余里的东线布防，一四一师一部在冷口至董家口长达80里的西线布防。这一段长城因历代迭遭破坏，到处是“口”，有的地段可说是口口相连。总长200余里的防线，由不足万人的两个师把守，兵力显然十分薄弱。东线一三九师只好采用一线配置。商震赴前线阵地视察之时，曾命该师参谋长石彦懋改为纵深配置，以免被敌人一撞即破。但是，正为兵力不足而焦躁的石彦懋告以商震，一线式尚感拮据，根本无力作纵深配置。石问商震：“军长，我们是真打，还是摆摆架子？”商震激动地说：“为什么不真打？”石又问：“真打为什么不将全部兵力调到前线？”商无法再答。这样，冷口一线就形成处处有防、处处薄弱的状况。

日军对长城各口采取各个击破的攻势，国民党军因没有全盘周密部署，各口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就谈不上什么协同作战。日军在喜峰口受重创以后，随即调转兵力，向长城防线的薄弱点冷口展开进攻。

商震部队与日军第一次交手，是在3月初与东北军换防之时。3月6日，日军十四旅团由热河凌源出发向冷口进击，敌甫抵冷口，适一三九师先头部队也赶到冷口，趁敌立足未稳，猛打猛冲，将敌逐出，冷口复归我手。3月22日，日军再次进攻冷口，一三九师奋勇抵抗，商震亲临前线指挥，经连日战斗，日军未达到目的，停止进攻。3月27日，日军头目武藤见攻长城各口不下，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主力向东线冷口一带移动。4月上旬，日军第六师团长坂本率所部3万余人猛攻冷口、白羊峪等要隘。敌人首先派飞机疯狂轰炸，随后

以主力进攻我前沿林作桢团，另一部向我主阵地蒋纪珂团左翼猛攻。由于我军居高临下，占据有力地形，敌人几次仰攻均被击退。日军见强攻无效，乃调集优势炮火，配合飞机向前沿阵地猛烈轰击。我山顶工事多数被摧毁，伤亡甚多，营长张克巽等阵亡。敌人骑兵又配合步兵向侧翼迂回，战斗愈来愈残酷。

在战斗激烈之时，前沿部队曾屡次打电话至开平商震指挥部，要求其派部队增援。但商只要求前方顶住，并未及时派兵支援。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据守白羊峪的一四一师七二一团第三营因伤亡惨重，营长戴瑛又告失踪，终被日军首先由此突入，随之冷口等要隘被迫放弃，全军撤至滦河。在部队撤退途中，援军方至，但为时已晚，败局已定。冷口失陷引起连锁反应，紧接着冷口之左翼五十三军杨正治部所守之界岭口受到威胁，旋即失陷，次日喜峰口要隘亦被迫弃守。

冷口抗战之役后，商部退至滦河一带，4月底奉北平军分会命撤至平谷、三河、通县一线，以防日军从兴隆、古北口南侵。在败退之际，商震给失守白羊峪的一四一师七二一团团长郭维藩以“撤职，永不录用”的处分，师长高鸿文亦给予申斥。

冷口作战失败除其他因素外，商震痛感所部除了武器装备落后、士兵素质较差。在参加长城抗战时，三十二军刚刚完成扩编，士兵均未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仓促拉上战场，战斗力低下也是冷口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震部防守冷口失败，遭至指责与非议。但是，商本人并未受到任何处分，可见当时蒋介石政府对长城抗战确是摆摆样子，没有真心去打。以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之态度，纵使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失败也是必然的，

四月十一日，敌人从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